

新加坡講華語運動研究

張君川

前言

1979年，新加坡由其總理李光耀推動「講華語運動」（「推廣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鼓勵佔新加坡全國七成人口的華族使用華語，以改華裔因不同籍貫而使用不同方言的習慣，主要是為了文化傳統傳承的問題而推動之。

本文試討論新加坡推動講華語運動的發展過程與歷史、社會、文化、政治等背景脈絡。

新加坡的華人族裔

根據2011年的統計，新加坡的人口有74%是華裔，13.3%是馬來裔，9.2%是印度裔¹。在一個彈丸小島之上有如此多元的族裔組成，可以想見歷史上的新加坡絕對是交通輻輳之處，更是文化聚合的地方。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南端，據於麻六甲海峽一隅，是東西航運線上的重要據點。新加坡早期就已有馬來人定居；另外，華人因海上經商貿易之需，也旅居於此，明代時稱之為「淡馬錫」，是爪哇語地名。1819年，英國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萊佛士登陸新加坡，開啟了新加坡的英國殖民時代，隨著港口貿易愈趨發達繁榮，吸引了鄰近地區大量的馬來人、印度人以及中國沿海地區的華人移民至此，也成為日後新加坡的主要人口組成。二戰時，日軍於1942年初擊潰英軍，短暫地佔領新加坡；1945年戰敗後新加坡又重回英國的統治。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權。1963年，新加坡與馬來亞、沙勞越等地組成馬來西亞聯邦，正式獨立。然而，1965年因政策走向之不合以及因政治引起了種族暴動，馬來西亞首相東姑拉曼為避免局勢惡化，要求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並由以巫統為首的執政聯盟修憲解除新馬關係，新加坡正式成為主權獨立國家。

在此，本文僅試討論新加坡華人的背景與組成。前已提到新加坡的人口組成有七成是華人，然華裔族群內部同質性並不高，華族內部就有不少大小族類，各有其母語，有時候這些方言能互通，有些則沒辦法。福建（即閩南）話中，包含漳州、泉州、金門、廈門等方言，其他還有閩北、廣東、廣西、客家、江浙等，大多屬華南各地的方言。閩粵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多，其中又以廈門話最為通行於華人社群之中。

¹ 參見新加坡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網址：
<http://www.singstat.gov.sg/pubn/reference/yos11/statsT-demography.pdf>。上網日期：2012.05.27。

論者指出，華族內部的語言使用除了方言的歧異，還有因教育制度轉變而形成母語與第一語言不一致的現象，中年以上的華人，受華文教育者，以方言為母語、華語為第一語言、英語為第二語言，受英文教育者，則英語為第一語言、華語成了第二語言；年輕一輩的華人則以華語為母語，進入學校以後，英語成了第一語言，華語反成第二語言。²

英語在新加坡的語言地位高，因為其原本的歷史背景、以及政治、經濟等因素，使之成為政治與法律語言，而這也影響到教育層面。透過教育政策的實行推動英語的學習，國家權力在建構的過程中一方面也建立起英語的（霸權）地位，其在社會上通行的範圍自然最廣。講華語運動的推行，其旨在提高華語在新加坡的語言地位，它與英文一樣不是多數人的母語，但是華語的經濟價值日漸提升，政府也有其政治上的需求，因此必須提高華語的地位以期能因應國際經貿與政治的新局面。

講華語運動

1979年，在華裔總理李光耀的推動之下，政府發起長期的運動以提倡華族使用華語作為溝通的語言。講華語運動的實施有三個主要的官方目的，一是教育層面的目的，因為方言在家庭中的普及某種程度造成了兒童學習的障礙，孩子在學校裡學習英語及母語，但是華語在家庭中容易被方言所取代；其二是文化層面的目的，即肇因英語的支配地位，迫使新加坡華人必須透過華語提供文化載台，一方面「再族裔化」（re-ethnicized）另一方面要抵抗西方文化對華人的「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³；第三則是溝通面，其目標在於減低華族家庭對於方言的依賴，希望年輕一輩的華人能養成在家用華語溝通的習慣，並希望這樣的家庭習慣能延伸到社會上，形成社會常用的語言。

在華語的推廣方面，每年由政府不同單位實施宣導，報章、廣播、電視、海報、以及各類型相關活動，將華語運動的資訊傳布到華人社群的每個角落；每年由不同機關單位輪番負責宣傳，就有這樣的企圖與功用。除了認識層面的宣導，教育部與相關單位也著手各種華語教學課程，針對不同的對象、語言程度而設計。同時，政府機關也制定一系列行政措施，以鼓勵華語的使用，諸如在行政機構使用華語；對電視、廣播方言節目的限制；以及語言景觀的重整、就是將地名、街名以漢語拼音取代等等。

另一方面，1982新加坡教育部推動儒學運動，將儒家倫理編入課程，有延續也有創新，在教學上普及、現代化；設立研究機構深入學術研究；邀集海外學者訪問；並且雙軌進行，以華語宣揚儒學、也用英文討論儒學。

² 雲惟利編，〈語言環境〉，《新加坡社會與語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頁12。

³ Wendy Bokhorst-Heng, Singapore's *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 and the imaging of the nation, *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 p.243.

爬梳講華語運動的推行與其針對的對象，1979年，第一屆講華語運動開幕，在教育部的協助下設計了華語會話的課程。1982年針對華族公務員與公眾人士開辦華語課程。1983年電信局提供「打電話學話語」的服務，繁忙時平均接到約四萬通電話。1984年推廣的目標對象是華族家長。1985年對象是公共交通工友。1986年對象鎖定餐廳場合的顧客。1987年對象是白領階級，並由衛生部提供華語的保健教學電話熱線。1989年，目標提升到整個華族社群。1990年對象是公司行號高層。1991年對象是受英語教育的新加坡華族。1996年正式啟用講華語運動的網站，1997年推出各式網頁及活動。1998年「推廣華語委員會」正式更名為「推廣華語理事會」，以彰顯其更重要的角色與地位。2000年，推廣華語理事會與青年音樂家協會製作新加坡首張華語清唱專輯。⁴

由此可見，講華語運動在前幾年內就深入研究語言及文化課程甚至是學術上的探討，而且很有目標地每年改換實施對象，從上而下逐步推廣至華族社群內，並透過不同政府部門、各種大眾傳播媒介以普及華語的使用，進一步改變語言景觀，使華語的使用能真正深入日常生活之中。

從語言政策發展看講華語運動

我們從政策的層面看華語運動的推行，新加坡的政策發展與規劃提供了華語重要的社會、政治地位。新加坡在獨立之前在政策上就已一律平等對待四大語言，唯接受馬來語為國語，並採以馬來西亞為主的課綱與教科書。獨立以後，1966年實施雙語政策，此後英語成為族群之間共通的語言；即便到了1979年，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以保障華語的價值，仍不變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地位。同年，政府根據〈吳瑞慶教育報告書〉，採行新學制，從小學開始實施分流制度，漸漸將四大語言學校統一為全國統一流學校，依英語與母語能力為篩選分流之標準。論者以為這是種「掌握英語式的雙語主義」（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塑造國民的多語能力，同時——以此為例——建構英語—華語的雙語模式；新加坡的語言規劃也就從原本「非標準的雙語主義」（non-standard bilingualism）朝「掌握英語式雙語主義」邁進。

在新加坡的語言及教育政策發展的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英語在此中還是扮演語言與文化霸權的角色，然而英語也是超越種族界線的語言，具有國家整合並減少種族內部衝突的功能；華語之於華族的地位或許就如英語之於新加坡人一般，有著超越族群的合法性地位，又有整合與減少摩擦的功能。關於這點，李光耀在其回憶錄裡曾提及這個問題，在〈一種共同語〉一章的開頭就說：「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國深造期間，我們遇上了一些中國留學生，開始意識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這種失落一方面是出於文化價值觀念的差異，更直接

⁴ 參見「講華語運動」網站「里程碑」。網址：<http://www.mandarin.org.sg/?p=957&lang=zh-hans>。上網日期：2012.06.11。

者，「我個人感覺到，自己跟講方言和華語的華族群眾有隔閡。」⁵這段話與後來講華語運動的推行之關聯容後詳述。

一直以來新加坡都沒有一種共同語言，而是讓族裔語言各自發展；國家現代化以後則是透過法律的規範讓四種語言平等共存。然而，整個國家的發展與運作不是僅僅能靠族裔語言，英文因而成為超越族裔界線的語言；且不只是國內發展，在這個仰賴國際貿易的國家，英語勢必是重要的謀生工具。英語教學於是開始導入學校教育之中，雖然還是保留各族裔語言的重點學校以為源流學校，但英語的影響力日漸提高，改變就業市場的需求；1953年因應華人對華語文的文化、教育之需求而成立的南洋大學因而出現畢業學生就業困難、學生素質下滑等問題，李光耀決心在南大情況惡化之前插手干預，將南大整併入以英語教學的新加坡大學，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教學體系的失勢，一方面是因應時代潮流的結果，另一方面，華校所辛苦維繫的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等等恐怕因此而漸漸被揚棄而喪失；這也是李光耀所擔心，因此在華校漸少、南大遷入新大之後，李光耀認為應該是鼓勵新加坡人棄方言、講華語的時候了，遂開始推行「講華語運動」。

然而講華語運動的推行，某種程度陷入一種政策性的辯論，就是公共場域的行為是否過度干涉了私領域。1979年，李光耀曾聲明無法控制家裡所使用的語言；政府所針對的是公共場所的語言使用，如政府機關、餐廳、購物中心等等。然論者以為，李光耀的目標是讓華族習於兩種語言而非只是慣用母語，聲稱家庭乃政府不應涉入的領域，也就是將這個語言使用的決定權丟給父母。這個公、私領域的界線是十分清楚的，然而，這個運動的目標也十分清楚，就是要使華語成為華人的母語，而檢視其成功與否的標準——不管是李光耀還是吳作棟都曾提到——就是看家庭中父母與子女能否用華語交談。由此可見，屬於公領域的國家所推行的運動與私領域的家庭之間產生了矛盾，這在一九八零年代變成一個特別的問題，因為從很多角度看來，政府的努力似乎都太過深入私領域。

從大眾傳播看講華語運動

從大眾傳播的角度檢視講華語運動的推行，我們或許更能看出國家、及其政策的影響力。大眾傳媒是講華語運動的推動中一個關鍵的角色。

報刊方面，據統計，1982年新加坡共有十二家日報，三家英文日報、五家華文日報、一家馬來文日報、以及兩家淡米文日報，另一家則是四種都有。全國只有四分之一人口訂報，而有超過八成的十五歲以上成年人有每天讀報的習慣。廣電方面，SBC（Singapor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為半官方機構，無線電台有四個頻道四種語言（其中也包含數種華語方言）。全國三分之一的成

⁵ 李光耀著，〈一種共同語〉，《李光耀回憶錄》，台北：世界，2000。頁 167-180。

年人收聽廣播，不過多為馬來人、印度人。電視頻道則有兩個、四種語言的頻道，播送的時間比例分別是63%英文、24%華文、7%馬來文、及6%淡米文。由上可知，大眾傳媒產業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由於經濟成長、收入提高、教育水準、識字率都上升，這些都在政府的調整的政治脈絡下，因此大眾傳媒被視為是國家建構、社會發展的適當角色。1980年廣電法（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ct）賦予SBC權利，提供廣播電視等服務以提供知識教育娛樂等。反過來說，政府也有權給予或剝奪印刷業的執照，這些執照是每年更換的。

在文化部的整合之下，大眾傳媒肩負有實踐、評估與評價整個活動、並提供良好的華語學習環境之工作。在講華語運動開始推行之前，主流報紙就已經有提倡華語之重要性的社論刊出，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一時間風氣大開。總理李光耀本人亦以英語及華語透過電視、廣播發表談話，為社會大眾示範。電視的論壇提供公開的平台討論雙語政策、語言使用等議題，而報紙的社論對政府的這項運動表示支持與正面評價。此外，華文報紙更直接且積極地參與這項運動，舉辦各式活動如論壇、辯論、作文比賽、說故事比賽等等，還有發放免費的運動口號T恤等獎勵活動。報紙亦刊登運動相關訊息的海報、禁語等；同樣的，這些資訊也會透過廣播、電視播送。

報紙也評估並評價該活動的成果，作法就是大規模調查運動的成效；這些研究都成了講華語運動持續推行的的重要參考依據，我們也能從中看出該運動的成果與推行的程度。例如Straits Times的研究指出，81%的新加坡華裔青年比長他們兩歲的人更常使用華語。Nanyang Siang Pao針對咖啡廳、餐廳做研究，顯示華語的使用雖然增加，但是方言還是佔支配地位。至於推行的程度，96%十二歲以上在最初兩年裡曾聽過或看過運動的廣告。電視是最密集宣傳運動相關資訊的大眾傳媒，91%的人看過電視上的資訊，67%透過報紙知道；在一些研究中發現，38%的人曾經在收聽或收看華語運動之後起而行支持這個運動。而早在1978年七月，廣電當局就決定要逐步停止方言廣告以支持華語的推行，廣播節目則無，因為方言節目收聽人口太眾，但整體而言是有衰退的。

電視的宣傳最力，也因為他是學習語言的良好媒介。華語在電視上播放的時間比例增加，也有華語會話的節目，為的就是傳遞正確使用華語的概念，並藉由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傳媒工具將訊息傳遞到家中。

在此也順帶一提「新謠運動」的發展。一九八零年代初期，由新加坡的校園掀起一波音樂創作的風潮，引領新加坡民間的歌謠運動；此係新加坡前所未見的音樂文化運動，也在短時間內為新加坡人所接受，進一步促進了新加坡流行音樂的發展。

根據報紙的記載，1981年底創作歌曲在校園中漸漸興起，因為新加坡人意識到市面上的流行歌曲都是舶來品，若沒有自己的東西，將成「無歌的一代」。校園歌曲的創作由是興起，其中又以國家初級學院華文部學生最為積極，這些

人作詞作曲，有些甚至不是科班出身，純為熱情而創作。⁶

論者以為，該運動是深具國家、族群、世代等身分認同意識的文化活動，扮演新加坡新一代華族文化載體的角色。或也有人說這個運動之興，是得自於台灣民謠運動「唱自己的歌」的啟發，因為兩國的社會背景相仿，生活中有許多侷限之處，這個運動的興起與流行或許就是一種超越與解放，並試圖嘗試更多的生活方式，「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只有拼命接觸音樂」，用盡全力地摸索以後，走出一條自己的路。⁷但無論如何，這個運動的流行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世代的文化認同，以及這些華族子弟透過新謠、媒體展現自我，同時形塑出那個世代的華語文共同記憶。

新加坡社會與東南亞情勢

事實上，在推廣華語運動之前，早在十九世紀末已有一波推廣儒學的運動。彼時由新加坡的士人集團與官府合作，重新改編書院學塾的課程課本，並透過演講、詩文活動、設立「孔廟學堂」收購圖書、報章，宣講儒學，也有如丘逢甲、康有為等學者到訪。在領導人的努力下，透過中、英文雙語為媒介，以報刊傳播儒學。

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的華語運動有其背景脈絡，即六零年代建國以來的政治文化環境。1965年新馬分家以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關係既緊密又緊張，因為馬來西亞既掌握新加坡的供水，甚至在新加坡也有一個營的駐軍，對於新加坡的經濟貿易、民生甚至國家安全都有十足的影響力，但是新加坡與猶太人國家以色列有軍事合作、又與中共、蘇聯等國有所聯繫，這讓擁有眾多伊斯蘭教徒（其實甚至新加坡境內也有不少伊斯蘭教徒）而且反共的馬來西亞不得不施以壓力。而新馬在溝通國際事務的過程中難免牽扯兩國的國內事務，造成兩國關係的緊張，許多時候是族裔關係問題，其實究其根本，這個問題可回溯到1965年新馬分家的根本問題，就是新加坡主張建設「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而馬來西亞則期望建立「馬來人的馬來西亞」。⁸

此外，新馬與印尼的關係也格外重要。印尼是東南亞地區的大國，也是強鄰。1945年獨立以來，與英國、荷蘭的戰事不斷，荷蘭撤離時並未留下訓練有素的行政官僚與專業人士，而其民族主義式經濟政策使印尼貿易萎縮，經濟陷入困境。經濟問題造成新印關係有著基本的障礙，然而印尼的經濟發展時也需要新加坡的協助，經過六零年代的緊張，七零年代冰釋，甚至七零年代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赤化，新印也都站在同一立場，並保持經貿合作關係。

然而，馬來西亞與印尼兩大強鄰對華人多所壓抑甚至排斥；新加坡在兩國

⁶ 參見「彈唱人」網站之剪報「1981年，國初華文部同學的『自創歌曲』」。網址：http://www.tcrmusic.com/music_diaries/xinyao_museum/298.html。上網日期：2012.06.11。

⁷ 參見「彈唱人」網站之剪報「羅大佑談新謠」。網址：http://www.tcrmusic.com/music_diaries/xinyao_museum/281.html。上網日期：2012.06.11。

⁸ 參見李光耀著，〈新馬關係風雲變幻〉，《李光耀回憶錄》，台北：世界，2000。頁257-292。

之間、也與兩國共有地理、政治、經濟的背景，因此新加坡雖為華人主政，但不敢建立以華人為本位或主導的國家政策，以求生存。一方面，恐共思潮的流行讓新加坡不敢太過強調自己的華人主體性，擔心被貼上「第三中國」的標籤，讓自己的國際地位與情勢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論者以為，如李光耀等建國領袖皆為受英式教育的「峇峇」，對中華文化並無強烈認同，因此壓抑華人、以迎合馬來人。

八零年代，中共改革開放，沒有了共產主義輸出與滲透的威脅，在經濟上其實充滿機會；其實綜合來說是中共整體國力的提升，可預見地將帶來許多不同的面貌與實質的機會，而這是李光耀念茲在茲的，我們透過他的回憶錄可以發現他非常關注中共的發展情勢。因此新加坡領袖倡華語文，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相近關係，以期能拓展經貿合作。然實際上彼時的大陸仍反孔批儒；或許八零年代後期大陸的儒學討論熱潮可說是受「新加坡挑戰」以及海外華人的刺激所致。或謂東亞國家的經濟起飛是受儒家傳統的影響所致，新加坡此時強調儒家價值觀就是為了維持經濟上的競爭力。

政府的官方說法是為抵抗西方頹廢的思潮，因此要從道德教育著手，重拾傳統的價值與精神。於此同時，等於是新加坡華人重新認識自己的華人身分、重建華人傳統與文化精神。或許可說，建國至此，生存危機與威脅都已不存在了，自信心與獨立自主的精神大大強化，國家已邁向成熟而能走出自己的路。

然而到了九零年代，這個活動不再活躍。與八零年代新馬關係再趨緊張有關。馬來西亞雖未批評這個文化政策，但明顯感受其不安；新加坡國內也有族群不和諧的反彈出現，新一代的執政者也棄情就理不再堅持這個儒學運動。

論者以為，李光耀將儒家「內聖外王」的觀念轉化、逆轉為「外聖內王」，透過以文化、道德所樹立起的亞洲價值觀作為外交手段與西方抗衡，以儒家價值重新協調、建構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的次序，藉由這個社會工程解決新的社會問題，維繫社會的穩定。

結語

本文試從歷史、文化、社會、政治、以及傳播等面向討論「講華語運動」的推行。新加坡是一多元民族與文化的社會，即便華族內部都有相當複雜的族群組成與方言體系，就一個以商業貿易立國的城市國家而言，國民如何毫無障礙地溝通，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英語在全國的推行就是最為重要的文化工程，然推動英語也連帶影響族裔內部語言結構的變動，華族若謹守方言而不在華語上面下工夫，則可能喪失掌握下一波經貿先機；英語世界文化的滲透也衝擊華語教學的環境，講華語運動的推行就是為了因應國家經貿需求以及華裔文化傳統的維繫而實施。

該運動的推行，政府就扮演著推手的角色。即便我們看到的是大眾傳播媒

體不斷推波助瀾，然賦予媒體權利者，就是政府。新加坡政府積極透過媒體傳達其正式立場，這也是李光耀在其自傳中所承認的。⁹不僅政府，群眾也透過媒體發聲，新謠運動的勃興就是一例，他改變了新加坡流行音樂市場的結構，同時也是一種國家、族群、世代等身分認同與集體記憶的文化活動。

如果我們將講華語運動的推行放在東南亞局勢的脈絡下看，正好可以看到那是新加坡與強鄰馬來西亞、印尼關係最為和緩的時候，排華風潮暫時平息而共產勢力也漸漸不構成威脅的時候。華人得以從緊張的族裔關係中抬頭，並且試圖從西方文化的風潮中挽救起自己的文化根基，在現代國際政治中重新建構一套亞洲儒家價值觀；而講華語運動就是這套價值觀念的具體工具之一。

綜上所述，是對於講華語運動的發展與背景的一些討論。筆者對於東南亞事務不甚熟悉，行文的模糊與謬誤敬請指教。另，筆者認為講華語運動的推行與戰後台灣國語運動的實施有諸多相似之處，也或許有高度密切的關連；唯未查到直接的證據說明二者的關係，因此也未在這方面多有著墨，希望未來有更多資料與證據或是研究可資參考。

⁹ 參見李光耀著，〈政府與媒體〉，《李光耀回憶錄》，台北：世界，2000。頁 215-228。